



学术探索的脚步永不止息

——记广东省委党校陈鸿宇教授

陈鸿宇，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巡视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理论研究。“九五”“十五”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主持人，代表著作有《区域经济学新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发展新探索》《空间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等。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教师”称号，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授予“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



□ 张东霞

1988年底，广东省委党校的年轻讲师陈鸿宇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这是全国党校系统较早获得省级劳动模范称号的教师。《中央党校通讯》曾对此有过专门报道。

转眼间，30多个春秋如白驹过隙，陈鸿宇老师逐渐从一名讲师成长为知名区域经济学教授，先后担任过广东省委党校教研部主任、教育长和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2011年，陈鸿宇老师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休，但他对学术研究的探索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歇。至今，陈鸿宇老师仍任省政府参事、省人大常委会财经专家等社会职务，也依然在密切关注广东改革与发展的热点问题，为广东的区域协调发展积极贡献智慧。

顺应时代需求，扎根区域经济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陈鸿宇考取了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经过3年的脱产学习，因成绩优秀，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县处级的领导干部是省级党校的培训对象。为了拓展学员的理论视野，中南五省区党校联合组织编写《县经济管理》，当时初任教师不久的陈鸿宇也被选中，参加这本书的写作与统稿工作。跟着老教授们跑乡镇、下基层、访企业，在实践中验证了书本中、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理论，也慢慢积累了不少关于县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

陈鸿宇老师看到，当时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县域经济研究，基础理论的支撑还较为缺乏。于是，他萌生了要系统深入地钻研区域经济学的想法。经过几年的积累沉淀，结合自己从事党校教学的工作经验和调研基

础，1997年，他终于完成了《区域经济学新论》的撰写。这本学术专著，因为深度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国外区域经理论研究的结合点，对“经济区域”的内涵及其生成和运行规律、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业布局、区域开发与规划、区域发展差距等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归纳、界定和阐述，构筑起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后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及多所大学列为区域经济学专业书目之一。就这样，陈鸿宇老师从研究县域经济开始，迈进了区域经济学的大门。

紧扣时代命题，于现实中深耕理论

陈鸿宇老师认为，“如果仅仅拘泥于经济现象及其细节，研究者的认识就可能是一片段的、零碎的。因此，理论与实践只有在交织中才能前行”。从完成《区域经济学新论》开始，陈鸿宇老师已经初步形成区域研究的“一纵二横”框架，即按照研究对象的纵向历史发展阶段，重点剖析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产业布局两个横截面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由此找到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规律。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陈鸿宇老师主持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广东区域差距和梯度发展研究”时，对传统产业梯度推移理论提出质疑，明确提出不平衡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形态，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进而在理论上阐明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机理，论证了梯度推移发展战略适用于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空间，正确运用这一战略，最终可能缩小区域差距，从而实现协调发展。

随着对区域经济的深入思考和研究，2000年以后，陈鸿宇老师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区域圈层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形态演化等基本理论问题。“十五”期间，他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粤港区域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研究”，通过对区域经济梯度发展中的“后核心区”问题和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区域圈层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的分析，构筑了“动态的区域圈层理论”基本框架，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机理、特征和效应做出了初步解释，多视角地描述了粤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所必需的空间支点、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和生态环境等支撑条件。

基于问题导向，行走在现实与理论研究的边界

做学问就犹如在现实研究和理论研究的边界上行走——这是陈鸿宇老师常常告诫自己的话。他认为，在山脊上的每一步要走得更稳更扎实，就必须以现实研究去印证书里那些理论是否正确；而在理论研究中，则要将自己学习到的新经验、新做法在实践中加以提炼，归纳和深化，再把这些观点重新放回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得到校正和完善。

学术研究的道路正是这样，当初陈鸿宇老师发现县域经济研究缺少理论支持，开始涉猎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当他将区域经济的基本研究框架引用于现实研究时，又发现广东和全国的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圈层布局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总结。当理论上刚刚描述了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的互动轨迹，现实中又要求对后工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城市化形态做出诠释。

陈鸿宇老师认为，行走在理论与现实的边界，面对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之间永恒存在着的矛盾，一名学者在做基础研究时，绝不能离开现实问题的导向，不应该做既离开学科前沿又不涉及现实的选题；另外，面对现实问题时，也不要单纯满足于用理论工具或数学模型解构现实，应着力在现实研究中谋求理论的扬弃和创新。

基于这样的想法，陈鸿宇老师将区域经理论的研究框架应用于现实研究，两次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相继形成《广东沿海经济带建设研究》《区域经梯度推移发展新探索》《空间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新型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发展》等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直面发展热点，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

2010年，陈鸿宇老师被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与来自社会各界的参事一道，为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提出决策咨询参考意见。他利用专业优势深入基层调研，围绕广东省的区域协调发展、创新驱动战略等热点、难点问题，向省政府提交了23份有质量、有深度的调研报告，全部获得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批示。

2011年9月，陈鸿宇老师获得了“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荣誉，同年11月，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杂志，取“知屋漏者在宇下”的寓意，为陈老师开辟了个人专栏“宇下者言”。在这一方天地里，他至今已经发表了40篇经济学随笔，先后围绕“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怎样把草根企业编织起来”“怎样才是理性的有意义的比较”等经济热点问题，多视角成系列地撰写文章，立意深、新意浓，文风犀利流畅。

党的十九大以来，陈鸿宇老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提交了关于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特别合作区的参事建议，内容深刻，富有见地，在广东省参事决策咨询会上相关内容的发言获得省委书记李希同志和省长马兴瑞同志的充分肯定。



生命不止，探索不止，理论之树的常青也正源于孜孜以求的探索。回溯学术生涯，陈鸿宇老师常言，与前辈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功底还是很浅薄的。在熟知处辨识新知，于现实中反求理论，从问题里倒推规律，这样或许在学术道路上会走得更踏实些、更长远些。

相比较而言，三个阶段中最难“走”的还是第三个阶段。材料有了，题目有了，要取得有独到见解的研究就比较难了。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往往走过前两个阶段，或见异思迁，或浅尝辄止，或知难而退，最终半途而废，没有获得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是殊为可惜的。

总的说来，治学是扎扎实实的功夫。从老一辈治学经验看，读书再多，课题再多，如果在探索阶段没有取得长足进步，都是劳而无功的。施蛰存的三段论可以说是一个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实录。今天，重温老先生的治学三段论，从三段论中找到做学问的方法，愿更多的学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核心阅读

传统开放经济理论强调区位、距离以及沿海、沿江等重要因素，以此形成的一个观念则是，内陆地区无法发展开放经济，内陆只能发展封闭型经济。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有助于人们思考内陆经济开放发展的路径，为深化开放经济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认识和思路。可以说，“一带一路”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开放经济的新内涵和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大幅度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区域经合作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也强调了“一带一路”建设对国内区域经开放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具有丰富的区域经合作和内陆开放经济发展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促进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合作新发展的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中国内陆经开放发展的重要引擎。5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经合作，加快国际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抓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积极参与与全球开放合作，同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也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参与全球经合作发展迈向新的历史台阶，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合作的方式、手段、水平和能力也达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近几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以“五通”为抓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全球投资、贸易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区域经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实施和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参与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继续开放创新和共享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从促进国内区域经合作发展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还在于促进国内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有机融合，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实现大国内区域经协调发展，开辟大国内陆经开放发展的新实践。“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带动中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放合作，通过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联互通，实现要素流动，促进国内产业转移与合作发展，构建国内区域产业合作新链条；另一方面也带动中西部地区与中亚、西亚和南亚以及东盟地区互联互通，实现大区域开放合作新发展，从而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极大地提高我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推动我国开放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促进国际区域经理论创新发展，也开辟了大国内陆经开放发展的新实践和新理论。值得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国际区域经合作发展的理论创新，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区域经一体化理念和理论。一是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合作与发展的理念，弥补了传统全球化发展的失衡机制和缺陷，从整体上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二是体现了共同发展的新理念，超越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和“国际援助”理论，有助于重新认识大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发展的关系，通过“共同发展”的理念补充

『一带一路』推动区域经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

□ 权衡

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和概念，具有理论创新价值。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市场主体、政府引导”的新型发展模式，超越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单一“市场价格机制”假说，既发挥市场主体和企业合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发挥政府在推动国际合作中营造法治环境、竞争环境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政府合作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民生项目、就业促进、教育合作、人力资本开发等引导作用，有助于提高国际发展与合作的质量和水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丰富和创新了国际经济学的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开放经济理论创新发展。传统开放经济理论更加强调区位、距离以及沿海、沿江等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基于经济地理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海洋运输、港口贸易等是完全吻合的。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关注开放经济的着力点总是在沿海、沿江等地区的开放发展；而且世界经济发展和历史和实践也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沿海城市等，总是率先发展开放型经济。与此形成的一个观念则是，内陆地区无法发展开放经济，内陆只能发展封闭型经济。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有助于人们思考内陆经济开放发展的路径，为深化开放经济理论创新开辟新的认识和理念，即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现代科技创新、信息化高度发展、航空经济与空运时代的到来，内陆经济也可以发展新型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尤其是通过提升产业能级、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流动，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带一路”本身可能会成为内陆开放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开放经济的新内涵和新空间。认识这一点，对于思考“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东、中、西部开放联动发展，以及中西部内陆经济向西开放新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示。

治学三段论

□ 孙建清

如何治学，研究学问，这是学人经常探讨、常说常新的话题。30多年前，施蛰存先生贡献给青年学者的治学三段论，值得思索。

在长达8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施蛰存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博古通今，颇多建树。他的《唐诗百话》《宋元词话》和《水经注碑录》等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他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词学》亦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学术刊物。

尽管施蛰存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有着很多贡献，但他却十分谦虚。依施蛰存看来，治学这个名词，意味着整个过程。任何人都不是从一开始就成为学者研究学问的，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施蛰存把它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关于这门学问的各方面的情况。第二阶段

是，既已熟悉了关于这门学问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后，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去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才达到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

梳理施蛰存治学的三段论，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治学渐进的轨迹：收集资料—发现问题—深入探索。这三个阶段，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仅走一段或两段路，未完成治学的全过程，显然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而言，施蛰存用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诫青年学者说，由于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虽治过多年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这当然是他的谦辞，但由此也折射出他对三个阶段的重视和自省。